

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

简报

2015年下期（总第13期）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2015年12月15日编印

●【信息速递】

一部反映湖南文献发展及成就的知识长卷

——《湖南文献撷珍》出版..... 2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李致忠率专家组来湖南调研..... 3

●【学习心得】

参加“第二期全国碑帖拓片修复技术培训班”随笔..... 4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第三期全国古籍编目合作进修班学习小记..... 4

●【麓山书话】

《湖南文献撷珍》前言..... 7

湖南文献史概述..... 8

●【文献撷珍】

禹碑..... 18

楚简楚帛..... 19

敦煌写经..... 20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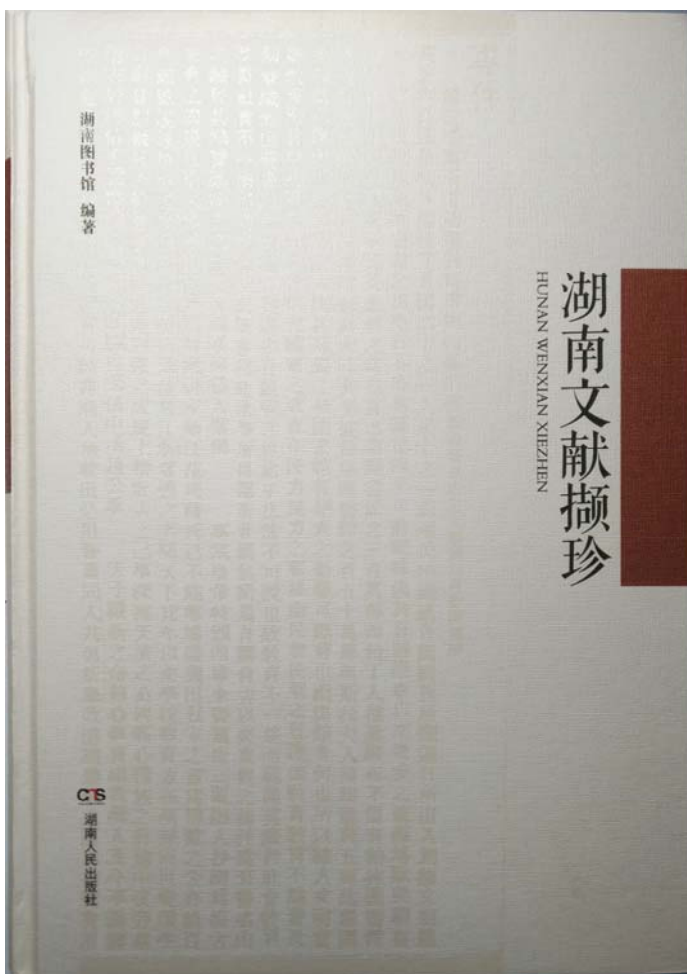
●【信息速递】

一部反映湖南文献发展及成就的知识长卷 ——《湖南文献撷珍》出版

目前,有关湖湘文化的图书可谓汗牛充栋,而关于湖南文献的图书寥寥可数。仅有的几种或专论湖南文献某一领域,或提要湖南文献若干著作,皆不足以全面系统反映湖南文献的发展脉络、影响及成就。

2015年8月,湖南图书馆编纂的《湖南文献撷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三部分,上编列举近百种对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影响甚巨的湖南文献或文化活动,自内容最古的湖湘文化传说——石刻文献《禹碑》,湖南现存最早的文献实物——战国末年楚简帛书,湖南最早的藏书活动传说——二酉藏书,至民国间湖南革命文献,以至当今湖南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湖湘文库》,上下五千年间重要文献,娓娓道来。下编则列举当代湖南各公藏单位所藏珍贵文献,宋元旧槧、明清稿本,皆美不胜收,琅琅大观。附编则为历代有关湖南或湖南人所创作的书画作品。为增强全书的系统性,后



附一篇全面论述湖南文献发展历史、各时期文献特征的长文。

全书文字通俗,知识性、可读性并重;一文一图或一文多图,阅读与鉴赏相融。是一部图文并茂反映湖南文献、湖湘文化发展历程的知识长卷,也是作为全省最大的湖南文献收藏及传播基地、湖南文献及湖湘文化的重要研究机构——湖南图书馆对湖湘文化的又一重大贡献。(寻霖)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李致忠率专家组来湖南调研

11月3日，由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李致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翁连溪，天津市图书馆研究馆员李国庆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管理组副组长郭晶组成的专家组来到湖南，对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以了解湖南省古籍普查数据的进度、著录、分类以及排序情况，并督促开展《中华古籍总目·湖南卷》的编纂工作。

座谈会上，李致忠先生首先对湖南图书馆古籍藏量大、质量高、前期编目基础工作完善予以了充分肯定，希望在此良好基础上，省中心能尽快启动《中华古



籍总目·湖南卷》的编纂事宜，率先完成分省卷，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起到垂范带动作用。随后，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雷树德介绍了目前湖南省古籍普查的进度，展示了各收藏单位的普查数据，并提出了普查工作中的难点以及今后工作的设想。最后，专家们畅所欲言，分享了“抓大放小”“同步实施”的具体经验，以及“措施到位”“责任到人”“成立专门工作组”的具体方法。

专家组此行对省中心的古籍保护工作给出了建设性意见，提供了实际性指导，对《中华古籍总目·湖南卷》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侯永慧）

●【学习心得】

参加“第二期全国碑帖拓片修复技术培训班”随笔

2015年7月24日，为期一个多月的“第二期全国碑帖拓片修复技术培训班”在上海圆满结束。碑帖拓片修复技术培训班，国家保护中心已经办了好几期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虽然在2007年古籍修复初级班有所接触，但时隔这么长，平时又没有机会练习，碑帖拓片的修复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挑战性的。

学习期间，理论课与实践操作穿插进行。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西泠印社社员唐存才的私人藏品让我们大开眼界，还很荣幸地收到了唐老师珍贵陶文拓片小样。沈培方、仲威、冯磊、陶喻之老师有关碑帖理论的演讲，深深地吸引着同学们一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早晨、中午也成为我们的操作时间，常常错过饭点；值班老师到了下班点天天催，也动摇不了我们执着的心。值班老师干脆提前半小时提醒，到点硬性关灯，大家才“哎哟”一声，无可奈何地收工。

短短的二十几天实践，我们要做三种碑帖装帧形式，镜片、经折装及立轴，还有拓片修复。同学们五个人一组，就着一张2×3米大小的桌子，大家轮流做。那急切切的眼神让人看着都揪心。

镜片这种装帧形式比较简单，裁齐画芯，裁好镶料，镶上绫子就算完成。虽然曾经在国家图书馆学习时做过五镶经折装，但这一次做的是拓片的经折装，南北师傅都是顶级大师，够我们受用。立轴是个磨人的活，平时的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统统得拉大锯、打电钻，剁天干、削榫头，干大男人的体力活。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拓片的修复，虽然只有短短两天的学习时间，我通过录音、录像、视频，掌握了破损程度不同的拓片的修复方法。回来后，如果有机会，很想再实践练习，加深巩固拓片修复技术。（施文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第三期全国古籍编目合作进修班学习小记

我虽就读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但撰写毕业论文时才第一次接触古籍原件，泛黄的古书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散发出历练与智慧的魅力。工作三年，经手的古籍不算少，版本鉴定一直是短板，欲学而苦于无门。幸而良机出现，我被录取为第三期全国古籍编目合作进修班学员，培训地点在风景如画的杭州。

开班仪式上，浙江图书馆徐晓军馆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在仔细询问每位学员的从业经历后，具体介绍了此次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及预期目的，并提出要求，希望大家珍惜学习机会，在练好古籍编目基本功的基础上撰写有价值的书志目录，实现业务水平的逐步提升。

前四周的培训内容为古籍普查，由古籍部普查组组长曹海花老师全程辅导。浙江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著录信息规范详实、有据可查，书影质量尤其值得称道。曹老师讲授了古籍普查平台功能及普查流程、著录细则等，并在随后的操作实践中负责审校学员所制作的数据。由于种种原因，我省并未使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故我对于平台十分生疏，尤其是填写各项依据、描述书影位置常不符合规范，书影模糊、定损不当也时有发生，经曹老师反复校改后基本熟练掌握操作要点，数据质量有所提升。编目实践中，我也切实体会到了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我经手的二册《陆凉州志》，纪事至道光二十五年，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总目》有（道光）《陆凉州志》八卷，民族文化宫藏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云南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单位藏抄本。而此本《陆凉州志》存卷七至卷十，卷数与著录不符，令人生疑。后经搜索阅得李硕《云南地方志考》一书，内云：“云南省图书馆藏道光原刻本，仅存卷十艺文一卷。……是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八卷本，《云南省图书馆地方志目》著录为十卷本，核对原书，应为十卷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误。”至此疑窦顿解。是书又钤有“振藻私印”“楚州童氏收藏图书”等印，知其为童振藻旧藏。童振藻，字仲华，江苏淮安人，中举后以候补知县分发云南，辛亥革命后曾任职于市政府、省政府、省立中学等，撰有《云南温泉志补》《云南地震考》《昆明市志》《云南方志考》《云南土司考》等书，民国二十年（1931）卸任后寄籍杭州，去世后留下五间房的藏书。是书末叶粘有售价签，可知曾流落至古旧书店，愈觉难得，“书比人寿”诚为至理。

普查期间，古籍部首席专家童正伦老师讲授了《古籍分类》《古籍版本》两门课程，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却别开生面，富于启发性和指导性，令我耳目一新。古籍分类研究目前最为薄弱，是几乎空白的领域，童老师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总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手册》所列类目进行横向比较，逐类逐属

分析其设置，指出某些不妥或缺失之处，引人深思。谈论古籍版本鉴定时，又从书法艺术角度辨别原刻本与覆刻本，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提供了新视野。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老师讲授《写本学：21 世纪的新学问》，系统介绍了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写本文献，指出写本文献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影响空前，既是各种字体尤其是异体俗字的大宝库，又含有丰富的口语资料，且未经后人校刻窜改。张老师还特别讲解了写本文献中特有的校读符号，对于今人整理与研究古旧文献具有重要作用。

培训的第二项内容是撰写论文，要求以所选浙江刻书家为题进行论述，角度自定。学员们选定题目后，在童老师的指导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搜集资料、拟写大纲、组织文字，虽然时间紧凑，但终于如期完成。论文最后交由专家组评定，并在孤山之颠的藻思阁举行了答辩。专家组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老师、上海图书馆郭立暄老师及童老师组成，专家们对论文逐篇进行了点评，并就行文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学员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会根据诸位老师的指导对论文进行再打磨。最后，吴格老师做总结性发言，充分肯定了古籍编目合作进修班这一培训形式及所取得的效果，勉励古籍从业人员保有一份痴情，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培训期间还安排了实地参观学习，如浙江图书馆善本书库及古籍修复室、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馆、西泠印社印泥制作研究中心、石刻大师黄良起工作室、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等。通过参观与交流，学员们开阔了视野，对古籍工作产生了新的认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我最难忘的莫过于嘉业堂所藏古籍版片，约十五万张，主要来源有二，一为藏书家、刻书家刘承幹所刊刻，一为浙江官书局所刊刻，另有部分为私人捐赠。嘉业堂版片库房内有刘承幹订做的版片架，木质，中有栅栏，既利于存放，又方便提取，版片林立，井然有序。早在 2010 年，“嘉业藏书楼版片保护工程”即已启动，保护和整理工作持续进行中，确为远见之举。

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虽已结束，但学习永无止境。正所谓躬行践履，所学所得只有落于实处才有价值，这也正是举办培训班的初衷和意义所在。（李娇）

●【麓山书话】

《湖南文献撷珍》前言

人类文明的进步成长，离不开文献的积极推动。文献的生产利用、源流聚散、传承流布等一系列社会运动过程，促进了知识的流动和创新，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生生不息地前进。

湖湘社会数千年来的辗转腾挪、递嬗演变之间，湖南文献的推动力量显而易见，且在古往今来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发展轨迹。回溯悠久而漫长的湖南古代文献发展史，在浩繁如烟的古籍中撷取那些有代表意义的文献节点，搜寻那些有重大影响的湖湘文献著作和文献学家，就是意图在考镜源流中顺藤而下，探索到湖南文献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勾勒出当今湖南文献的发展趋向提供史料佐证。

钱基博先生说：“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强有力”无疑就是对厚重强劲的湖湘文化的最好概括。湖湘文化正式形成和崛起于宋代，其理学之发达，赢得了“道南正脉”、“潇湘洙泗”之美誉，而清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使其大放异彩，谭嗣同、黄兴、毛泽东等秉承有绪，一以贯之，文化精髓之流布至现代，湖湘文化仍是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区域文化。而追其源头，除开繁衍于斯的荆楚文化和瑰奇神秘的蛮苗文化，甚至可以搜寻到炎黄蚩尤文化的踪影。而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湖南文献，从飘渺无定的峒嵎碑，到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帛画，从忧国忧民的屈原大作《离骚》，到始显声名的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唐代以前湖南文献已颇有影响。宋代时期湖南文献规模和种类大有涨进，理学、医学、史学、别集著作开始广为流传，明代则出现了影响全国的文学流派，清代更是四部聚珍，典籍益博，经世之作迭出，民国时期维新革命的兴起，颠覆了原有的文献类型和内容，新型报刊开风气之先，革命文献独具一格，现代则政府领衔，百家合力，铸就了“湖湘文库”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湖湘人物著书立言，著述繁多，汇集了湖湘社会之精华。

从湖南文献发展的实际历史和当今湖南文献收藏的现状出发，在浩瀚无边的典籍海洋中探渊索珠，图书、字画、简帛、舆图、碑帖等类型不一而足，撷取那些有代表意义的典型著作，用深刻的文字剖析其内涵，以精美的图片展现其原貌，来编纂一部图文并茂、意趣交融的文献图鉴史话，展现源自千年的湖南文献珍品，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为“湖南文献撷珍”之“珍”？当“本土之珍”和“外来之珍”之意，亦

可作“内容之珍”和“版本之珍”、“书之珍”与“非书之珍”解。为充分展示每种文献的珍贵内涵，随意散谈甚妙，精炼严肃亦佳，文风可严谨，亦可活泼，以特定的文化现象或特定的文献为陈述支点，通过人物、版本、收藏、事件等方面切入叙述，内容涵括作者简析、作品评介、价值阐述、流传故事等等，从而达到可读性、资料性、艺术性兼备的效果。

用一件件鲜活的文献实例，熔铸成一幅波澜壮阔的湖南文献史画，梳理出一条湖南文献的历史发展脉络，探索和挖掘湖南文献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能提供的强大动力，最终将推动湖湘文化的发展繁荣。（刘雪平）

湖南文献史概述

文献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因文献得以保存及传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会先于文献的产生。炎黄尧舜禹时期，为中国社会的史前时期，由于这一远古时代尚无文字记载，只留下了许多神话传说，因此又被称为“传说”时代。传说在距今 5000 年前（约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生活着三个主要的部落联盟：炎帝部落联盟、黄帝部落联盟及蚩尤九黎部落联盟。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曾联合起来打败蚩尤部落，并迫使其退往长江中下游区域，成为了以后南方“苗蛮”民族的最初先民。炎帝、黄帝与蚩尤，后人共称为“中华三祖”，而湘中梅山地区更是被认为是蚩尤文化的发源地及保存地，湖南也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源区域。由于远古文献的缺乏，湖南境内有关炎、黄、蚩尤及尧、舜、禹的传说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甚至是经过汉、晋人整理的典籍如《尚书》《国语》《战国策》《山海经》《竹书纪事》《墨子》《管子》等书中。这些著述都不是在湖南境内产生，内容也很少涉及湖南，因此不能称为湖南文献。传说大禹治水时曾深入湖南，并在衡山留下治水碑刻，即所谓“禹碑”。虽然历代学者多认为此实为宋代何致所伪造，却是目前所知内容最古的湖南石刻文献。

一、先秦时期湖南文献概述

先秦时期是湖南文献的萌芽期，目前湖南地区最早的实物文献产生于战国末年。除甲骨、石刻外，其他文献载体实物在湖南或多或少都有所发现。目前内容涉及湖南最早的金属文献是楚怀王六年（前 323）用青铜铸造、形似竹筒的《鄂君启节》，为怀王赐予王室成员鄂君昭阳在楚国境内从事运输和商品交易时过关免征关税的凭证。铭文中涉及的水道和地名共 20 余处，其中 8 处位于湖南境内，可见湖南已成为当时楚国重要经济和商业活动区域。

竹简木牍是纸张发明前中国使用最久的文献载体。湖南是迄今出土简帛数量最多、时代序列最为完整的省份。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湖南共出土简牍 10 余次，总计 20 余万枚，主要集中于长沙、龙山、慈利、沅陵、常德等地，尤以长沙居多。时代涉及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其中以三国简最多，秦简次之，汉简、战国简又次，晋简最少。战国简中如 1983 年在常德市德山夕阳坡 2 号战国楚墓出土 2 支竹简，一简 32 字，一简 22 字，其中一简有纪年，记载楚怀王二十二年（前 307）越涌君嬴率众归楚之事。目前湖南出土的战国简牍或内容以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为主，或因太过残缺无法整理，文献价值并不太高，却是湖南历史上出土的最早文献。

在简牍流行的同时，缣帛作为一种文献载体也同时存在，主要用于绘图或图文并茂的文献。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楚缣书，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也是湖南地区产生最早的、内容比较完善的典籍文献，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实物。帛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49 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及 1973 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这也是目前所知湖南最早的绘画，具有极高的宗教、艺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学术的起源时期，中国许多学术思想及学术著述皆起源于这一时期。在诸子之说各行其道，诸子之书层出不穷之时，湖南地区却寂寂无闻。此时期，湖南虽然产生了一些金属、简牍、缣帛文献，但都内容极其零碎，文物价值高于文献价值，其时湖南文献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直至战国末年，屈原所作《离骚》《九歌》等，为产生于湖南境内最早的文学作品。研究湖南文学者，莫不自屈原始。

二、秦汉时期湖南文献概述

秦朝因统治时间极短，以往在湖南很少发现秦代的文献。沅陵二酉山秦人藏书洞的传说，寄托了人们对文献的向往以及对先人保护文献的崇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纵横家”著录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是为正史上记载最早的湖南文献。2002 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出土了 70000 余枚竹简，其中有字竹简 36000 多枚，20 余万字，弥补了湖南秦代文献缺乏的空白。

汉代是中国文献的发展期，也是湖南文献的形成期。《汉书·艺文志》中所载西汉时湖南文献有《长沙王群臣赋三篇》。这也是唯一见诸正史的两汉时期湖南文献。

由于史载秦汉湖南文献全部失传，因此在历史上，这一时期往往给人湖南文献荒芜的感觉。然而自解放以来，湖南地区出土的大量简牍、缣帛文献，又使湖南一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献大省。1972年，考古人员在长沙马王堆发掘了汉初吴姓长沙国第三、四代王丞相利苍及其妻、子墓葬，其中3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尤以帛书居多，后经学者整理，凡50余种、10万余字，如最古的《周易》写本、最古的《老子》写本及四种黄老佚书，以及种类繁多的医学及天文、术数著述。这些帛书内容丰富，反映了汉代湖南地区科学、文化及艺术的发展状况，一部分科技甚至还达到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水平。

现存秦汉湖南文献，以出土帛书、简牍为主。简牍内容多为记载随葬品的遣策或零散的官府档案，属文献、文物的范畴，还不能称为典籍。而帛书内容较为完整，虽不一定为湖南人所著所书，却是湖南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典籍图书。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湖南文献概述

三国时期，湖南曾出现一个小小的人才波峰，1992年《湖南省志·人物志》收录秦汉至南北朝间人物仅31人，其中三国人物11人。（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最早的湖南人士著述自三国时始。然而三国时湖南著述人物极少，所著篇幅亦极其简略，多为奏议、告文，仅存数篇、十余篇而已，而且当时多未成集，故其时并无其书。今所传者，主要是清末善化陈运溶辑佚而成，书名亦由陈氏拟定，如《蒋恭侯奏议》《刘令君集》之类。

三国及以前，原是湖南历史上的文献空白期。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吴简的发掘，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出土简牍，共出土三国孙吴时期简牍14万余枚，数量超过了以往全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有文字200余万，超过了《三国志》的总字数。走马楼吴简是20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书、西北屯戍简牍之后，中国出土文献又一次重大发现。

中国古代人的著述，最初并无明确篇名或书名，后人在整理时，多以人名代书名，或取其篇首、篇中二字或若干字为书名。至晋时，中国著述才普遍有作者本人所题书名或篇名。两晋南北朝是湖南文献的奠基期，此时期湖南文献缓慢发展，文献产生的数量及种类都较前期有所增加。湖南人的著述已由秦汉时期零散的文章发展为成形的专著，而且内容也由史部政书奏议发展为涵括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并产生了一些在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著作。如东晋临湘邓粲撰《晋纪》十一卷，《文心雕龙》对其推崇有加，称：“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

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湖南人著述有明确自题书名者，应自东晋邓粲《晋纪》始。（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将邓粲所著列为湖南正史之首。又有南朝作唐（今安乡）阴铿撰《阴常侍集》一卷，阴氏原籍今甘肃武威，新化邓显鹤《沅湘耆旧集》以其居湘已五世，故以其为湘人而列为前编之首，收其诗 32 首。阴氏也是湖南最早的著述世家。

四、隋唐五代时期湖南文献概述

隋唐是湖南文化与文献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得力于隋唐以来实施并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书院讲学之风及雕板印刷术的发明。隋唐五代时期湖南产生了一大批士族或庶族文人学士，这也是湖南历史上的第二个人才波峰。与三国时期不同，此时期的人才以文化人才及科举人才为主。

隋代统治较短，著述无多。（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所载隋代湖南人著作仅华容释智顓所撰佛学著述约 40 种，多收入《大藏经》中。智顓是湖南历史上著述最多的僧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丰富的物质条件，优雅的士人生活，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唐代湖南人的著述以集部为主，产生了大量的诗文别集，并出现了诸如刘蛻、李群玉、胡曾、曹松、董徒、吴德光及湖南第一诗僧释齐己等在全国都较有影响的诗文作家。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唐代诗文全集收入者有澧州李群玉《群玉集》三卷后集五卷、长沙刘蛻《文泉子集》一卷及胡曾《咏史诗》一卷 3 种，是为湖南人诗文别集最早收入《四库全书》者。

隋唐五代湖南著作以长沙欧阳询所编类书《艺文类聚》影响最为深远，清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中。《提要》虽称“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但充分肯定其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作用：“然隋以前遗文秘笈，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亦所谓残膏剩馥，沾溉百代者矣。”据统计，《艺文类聚》引书多达 1431 种，这些古籍十之八九今已不存，现存者也与所引唐前古本文字有异，因此为校勘、辑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代之前，湖南历代存世文字多只鳞片爪、只言片语，赖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以存。唐代之后，湖南才有完整著述流传至今，如欧阳询《艺文类聚》《书法》、《刘蛻集》、《李群玉集》、胡曾《咏史诗》、释齐己《白莲集》《风骚旨格》等。但此时期湖南文献数量与中原地区仍有很大差距。如唐代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是一部专释儒家经典文字意义的辞书，采录书籍多达 230 家，其中湖南人著述仅“车胤等注”《讲孝经义》四卷。

五、宋元时期湖南文献概述

由于采取“重文轻武”国策，宋代在政治、军事方面一直处于积弱状态，但文化、学术却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时期，文献的数量及种类也都远迈前代。南渡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南政治、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开发与发现，文化事业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理学的兴起与传播、书院教育等方面，湖南都走在了当时中国的前列。南宋是湖南历史上第三个人才波峰，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化型人才与政治型人才相结合，出现了一些身居高位又学术精湛的著述人才，如宁乡易祓、永明周尧卿、湘潭路振、祁阳陶岳等。

宋代不仅是湖湘文化的形成时期，也是湖南文献规模及种类的形成及完善时期。隋唐五代，除集部书外，其他各类图书或缺乏或稀少。至宋代时，湖南文献不仅数量增多，种类也大为丰富，许多原来没有图书的类目，宋代时都或多或少产生了图书，并且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都出现了一些在当时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著作。《湘人著述表》著录 1949 年前湖南凡 8000 余人、著述 30000 余种，其中秦汉至五代近 1200 年仅 57 人、著述 114 种，宋元二代 400 年已达 198 人、著述 399 种，较前代已有较大发展。至此，湖南文献已赶上全国文献发展的步伐。

除周敦颐外，宋代湖南经学最著者当为宁乡易祓、武陵丁易东、永明周尧卿及耒阳秦昌期。湖南人经学著作收入《四库全书》者，自易祓《周易总义》、《周官总义》、丁易东《周易象义》始。史学著作较著者有祁阳陶岳《五代史补》、湘潭路振《九国志》、浏阳汤璠《建炎德安防御记》、常宁王居仁《救荒录》等。湘乡朱佐《类编集验医方》，是现存最早的湖南人所著医学著述。长沙刘次庄《淳化阁帖释文》在当时即流传极广。长沙王观国《学林》、平江罗璧《识遗》，是湖南最早的子部杂家类著述，皆收入《四库全书》中。宋代湖南人著述仍以别集为多，（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宋代湖南集部著述 80 余种，其中别集 60 余种。别集中若以时代论，则南宋居多，北宋无几。宋代湖南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者有湘阴邓深《邓绅伯集》二卷、衡阳廖行之《省斋集》十卷、祁阳陶弼《邕州小集》一卷、营道周敦颐《周元公集》九卷、宁远乐雷发《雪矶丛稿》五卷、武陵杨枋《字溪集》十二卷 6 种。又宋代湖南人所撰诗文评中，后收入《四库全书》者有宁远杨齐贤撰《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又署名王洙所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经学者考证实为长沙邓忠臣所撰。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南方汉人实施歧视政策，汉族文化也受到影响，故元代学术文化远不及宋代为盛，封建社会传统的正统文学体裁如诗词、散文等已开始衰

落。在传统诗文创作方面，湖南出现了以欧阳玄为首的主流派和以陈泰、李祁、胡天游为代表的山林隐居派。

（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元代湖南人著述 70 余种，其中经部书皆已失传；史部书中仅欧阳玄《至正河防记》一卷、《拯荒事略》一卷收入清道光间六安晁氏《学海类编》中，人多以为伪托。子部书中今有传本者医书类有衡阳曾世荣《活幼心书》三卷，术数类有武冈李道纯《周易尚占》三卷。道家类中李道纯诸作皆收入《道藏》中，李氏是湖南历史上著述最多的道家人物。元代湖南人著述仍以传统诗文为主，其中别集收入《四库全书》者有浏阳欧阳玄撰《圭斋集》十五卷、茶陵李祁撰《云阳集》十卷、茶陵陈泰撰《所安遗集》一卷、平江胡天游撰《傲轩吟稿》一卷、安仁马熙撰《圭塘补和》一卷 5 种；总集收入《四库全书》者有茶陵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四十卷及湘乡冯子振、释明本合撰《梅花百咏》一卷 2 种。《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者有欧阳玄撰《拯荒事略》一卷、武冈李道纯撰《中和集》六卷、茶陵陈仁子撰《牧莱脞语》二十卷《二稿》八卷 3 种。

六、明代湖南文献概述

明代湖南人才渐盛，是湖南历史上第四个人才波峰，也是湖南文献的兴盛期。据《湘人著述表》统计，明代湖南著述共 757 人、1481 种，数量较宋元有了显著增长。由于清廷对明代学术多持贬驳，故明人著述收入《四库全书》者数量反不及前代。明代湖南人经部著述收入《四库全书》者有衡阳王介之《春秋四传质》二卷、华容孙穀《古微书》三十六卷 2 种，史部有郴州何孟春撰《何文简疏议》十卷 1 种，集部有湘阴夏原吉撰《夏忠靖集》六卷、茶陵李东阳撰《怀麓堂集》一百卷及《怀麓堂诗话》一卷 3 种。

明代湖南人经部著述中，以戴君恩《读风臆评》一卷、《绘孟》十四卷流传最广。戴君恩是明末清初赏析派《诗》评家代表人物，其《读风臆评》从文学的角度解读《诗经》，形成了一种《诗经》评点的风气，是《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一部用评点的方式标举诗之艺术情味的上乘之作。明代以前，湖南人极少从事音韵学研究，虽宋代耒阳秦昌朝曾著《韵略分毫补注字谱》一卷、元代茶陵陈仁子著《韵史》三百卷，但二书皆不传。明代零陵桑绍良所著《青郊杂著》一卷、《文韵考衷六声会编》十二卷与郴州袁子让著《字学元元》十卷 3 书，都是湖南人研究声韵学的专著，标志着明代湖南学术风气及经学水平都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提高。

明人好作杂史及史评，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叙称：“明人学无根砥，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明代湖南人所著杂史类著述 14 种，其中至今有传本者有祁阳邓球撰《皇明泳化类编》一百三十六卷《续编》十七卷《杂记》二卷，华容孙愨撰《唐纪》五十五卷，茶陵李东阳撰《燕对录》一卷，华容刘大夏撰《宣召录》一卷，武陵陈洪谟撰《治世余闻》四卷、《继世余闻》四卷、《革除编年》不分卷。四库馆臣对明代史评多所贬斥，称“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存目著录湖南人所撰仅湘乡贺详撰《史取》十二卷、茶陵李东阳撰《新旧唐书杂论》一卷 2 种。

明代中期以后，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国外“北虏”“南倭”日侵，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空谈误国，转而开始研究典章制度及边疆问题，其间湖南人重要著述有祁阳邓球撰《皇明泳化类编》，湘潭张燧撰《经世挈要》二十二卷附四卷，长沙魏焕撰《九边考》十卷，茶陵廖希颜撰《三关志》十卷等。这些著述因多触清讳，至清乾隆时多遭禁毁。

明代，王守仁阳明学说在湖南得到广泛传播，《岳麓志》载：“（守仁）寓居岳麓，为朋徒斤斤讲良知之学，其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王守仁及弟子在湖南的讲学游历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湖南学者从王守仁游者甚众，尤以武陵蒋信为著。明代湖南人子部儒家类著述中，以蒋信、何孟春所著最多、影响最广。明万历年间，华容孙羽侯“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来至胜国，效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彙括《十三经》疏义，订核收采，号曰《儒藏》”。是中国倡纂《儒藏》的第一人。

明代后期，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有闲阶层，休闲消遣、养生鉴赏及曲艺类图书也大量产生。而湘人质朴，很少此类著作。明代湖南曲艺类著述主要有湘潭黄周星撰戏曲理论《制曲枝语》一卷及靖州许潮撰杂剧总集《泰和记》等，尤以许潮《泰和记》影响最巨。

明成化、正德期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一改明初“台阁体”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诗风，对全国诗坛有着振衰除弊之功，也标志着湖南诗歌第一次取得了全国诗坛的领袖地位，“茶陵诗派”也是第一个以湖南命名的全国性的诗歌流派。

七、清代湖南文献概述

清代是湖南人才大发展时期，也是湖南历史上第五个人才波峰，出现了诸如

王夫之这样全国一流的大思想家、学术家。清代也是湖南著述的极盛时期，（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清代湖南人著述凡 4290 种，超过以往历代湖南著述之总和。

汉唐时期，湖南经学极衰，宋、明两代才有所发展，清代湖南经学始盛。然湖南作为理学的渊藪之区，经学远不如江浙、安徽昌盛。清代湖南经学著作主要集中在《周易》及《四书》两大领域，其次为《春秋》《尚书》《三礼》及《诗经》研究，而文字、音韵、训诂小学领域一直没有形成整体发展的态势。与其他地区相比，湖南经学有着汉宋兼采、今古文并治的鲜明地域特色。清代湖南经学人物主要有王夫之、王文清、李文炤、罗典、邹汉勋、王闾运、王先谦、皮锡瑞等。李肖聃《劝学十篇》开列湖南先贤重要经学名著：《论语》有王闾运《论语训》，《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诗》有王夫之《稗疏》、魏源《诗古微》、王闾运《诗补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张登寿《诗经例表》，《书》有魏源《书古微》、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易》有王夫之《周易稗疏》、王闾运《周易说》，《春秋》有王夫之《春秋稗疏》、王闾运《谷梁申义》《公羊笺》《春秋例表》、皮锡瑞《春秋讲义》，《礼》有王夫之《礼记章句质疑》、王文清《仪礼句读》、曾国藩《读仪礼录》、王闾运《周官笺》《礼记笺》，《尔雅》有王闾运《集解》、罗焯《郝氏义疏补》等。

有清一代，学者以考据相尚，文人以诗文相高，士人以八股制艺是骛，官员则以无过是求。由于“文字狱”的禁锢，当代史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禁区。很少有人关心时务、讲求国计民生，以至国力日衰。湖南人治学，一直注重实用。道光以来，这种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表现得更是明显，形成了以陶澍、贺长龄、贺熙龄、严如煜、魏源、唐鉴、汤鹏、周寿昌为代表的湖南新经世致用派。当江浙、安徽学者尚沉溺于一字一句之校勘时，湖南人已开始注意军国大政、国计民生的研究与实践。此时期湖南人文献活动也由以往单纯对旧史的整理，或对旧典章制度的考证，转变为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民族区域历史地理及国外历史地理的研究。其间或其后成就较为显著者有魏源、严如煜、王先谦、王闾运等人。清代湘人当代史研究以魏源《圣武记》、王闾运《湘军志》最著，民族史研究则以魏源《元史新编》、王先谦《蒙古通鉴长编》最著，西史研究则以魏源《海国图志》、王先谦《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最著。清朝人物传记资料浩如烟海，然而由于编写宗旨与体例的限制，绝大部分人物传记资料要么只是原始资料的汇集，要么总叙一个地方或某一领域的人物，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清代人物的概貌

与整体。清代末期，湖南产生了二部颇具影响并至今使用的全国人物总传，即平江李元度所撰《国朝先正事略》及湘阴李桓所编《国朝耆献类征》。

儒家类图书一直是湖南历代子部著述之大宗。《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清代湖南儒家类

图书有善化李文炤撰《太极解拾遗》一卷、《通书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西铭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武陵胡统虞撰《此庵语录》十卷。道咸之交，太平之役，罗泽南、曾国藩等独以宋学相砥砺，以书生犯大难而成功名。自此国人轻宋学之风为之一变。清代晚期湖南理学著述如善化孙鼎臣《刍论》，湘乡罗泽南《人极衍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湘乡刘蓉《思辨录疑义》，善化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四贬斋省身日课》，谭嗣同《仁学》等，皆或多或少受王夫之思想影响。

清代湖南自然科学著述也有所发展，如收入《四库全书》的巴陵许伯政撰《全史日至源流》。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南出现了一个以邹汉勋、丁取忠为代表的算学人才群体，其主要人物还有邹汉池、李锡蕃、黄宗宪、左潜、曾纪鸿等。清末华世芳著《近代畴人著述记》，著录当时全国数学家 33 人，其中湖南便有 7 人。丁取忠所编《白芙堂算学丛书》，数十种当时乃至当今都不太为人所措意的图书得以流传，成为研究算学者必读之书。丁取忠也因毕生精力与财产皆萃于此而贫困以终。

清代初期湖南产生了一大批遗民作家，其中较著者如衡阳王夫之、湘潭郭金台、益阳郭都贤、宁乡陶汝鼐、湘潭黄周星、华容严首升等，清顺治康熙间皆有诗文集传世，至乾隆时几乎全部被禁。清代中期湖南诗人有湘潭张九钺、新化欧阳辂、安化陶澍以及新化吴棫、宁乡邓枝麟、醴陵鄢正笏、永绥胡启文、新化孙起楠、湘阴周锡溥、周锡渭“湘中七子”。清代中晚期，湖南诗坛人才辈出，在全国都颇有影响，首先出现了以魏源、何绍基、曾国藩为代表的宋诗派，其中湘军将领诗人，作品诗风多雄恣，表现了湖湘士子经邦济世平天下的豪情，而以巴陵吴敏树、长沙熊少牧、武陵杨彝珍为代表的士绅诗人，作品则多反映这一时期湖南的社会景况，较多描写了底层民众的疾苦。同光以至清末民初，更形成了以王闿运为代表的、以湘籍人士为中坚的全国性文学流派——汉魏六朝诗派，其中重要人物有武冈邓辅纶、武冈邓绎、湘潭释敬安、宁乡程颂万、湘乡曾广钧、长沙饶智元、湘乡李希圣、湘潭杨度、湘潭杨庄、武陵陈锐、茶陵谭延闿等。

清代湖南散文作家有衡阳王夫之、新化邓显鹤、邵阳魏源、湘乡曾国藩、湘

阴郭嵩焘、巴陵吴敏树、湘潭王闿运、长沙王先谦等。道咸间崛起的湖南经世派如陶澍、贺长龄、魏源、汤鹏等人撰写了大量有关时务政事的文章，打破了长久以来湖南散文写作的沉寂局面，其中又以魏源成就最大。咸丰年间，当桐城散文呈现衰势之时，曾国藩以桐城文章相号召，继承和发展桐城派的文章理论，强调文章“经世济民”“文章与世变相因”，并聚集了大量人才，创立了“湘乡学派”，使桐城派得以中兴。其中重要人物尚有郭嵩焘、曾纪泽等。

除别集外，清代湖南人还编纂了一些地方艺文总集。乾隆间长沙廖元度曾纂《楚风补》五十卷及《楚诗纪》二十二卷，记载湖南、湖北历代诗文。清代湖南地方艺文总集最著者为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及罗汝怀《湖南文征》。《沅湘耆旧集》二百卷，辑录明至清道光间沅湘诗人 1699 家、诗作 15680 首。显鹤子邓琮又辑前编四十卷，辑录晋宋以至元代沅湘诗人 330 家、诗作 2230 余首。《湖南文征》二百卷，是书因新化邓显鹤《沅湘耆旧集》仅采诗辞而不及古文，乃裒集元明以来文 700 余家，分类编次，凡元、明文五十四卷，清朝文百三十五卷又补编一卷，首冠以姓氏传四卷，并目录六卷，合为二百卷。湖南许多无专集、或文集已失传的人物及作品，皆因此二书而得以流传。

清代晚期，西学东渐，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宗教图书率先传入内地。湖南西学的传入缓慢而曲折，其间既有郭嵩焘、曾纪泽等人在其著述中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及文化，也有崔燠、周汉利用传单和小册子等倡导反西学西教。维新时期，新思想、新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些新的文献类型开始出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学政江标创《湘学报》，是为湖南连续出版物期刊之始；光绪二十四年（1898），熊希龄于长沙创办《湘报》，是为湖南报纸之始。

民国时期，是中国文献革命性变更时期，以反映新学科、新思想的新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内容的旧学；以用机器印刷方式产生的、以平装或精装形式出现的新书取代了用雕板或活字印刷方式产生、以线装形式出现的旧书。文献的类型、体裁、分类及产生方式、装帧形式都较以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图书、期刊、报纸三足鼎立，成为文献的三种主要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著述不同，民国时期的著述涉及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而湖南人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些重要人物与著述。民国时期，湖南人的著述以及湖南产生的文献数量又超过了以往历代湖南文献的总量。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区域及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湖南民国文献中革命文献及抗战文献颇具特色。

●【文献撷珍】

禹碑

很久以前，中国史籍上便有衡山云密峰或岫嵎峰“禹碑”的记载，称大禹治水时途经南岳时所刻。南朝宋徐灵期《南岳记》载：“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刘禹锡《寄吕衡州》诗说：“尝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圣功莫远服，神物拥休祯。”然当时并没有人见到实物，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创作诗文。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和张栻二人还曾赴岳寻访“禹碑”踪迹而未果。直至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川人何致游南岳时，突然出示一张拓片，自称临拓于岫嵎峰下。碑文上 77 个奇异的神秘文字，如虬似螭，诡怪难辨，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关于何致拓片，历代学者多认为其为何氏造伪。明末清初顾炎武即认为此碑为后人所造。清乾隆年间王昶《金石萃编》言：“此碑自南宋始出，故欧（阳修）、赵（明诚）皆不录。后来考据家如杨慎、杨时乔、安如山、郎瑛诸人深信不疑。余皆斥为伪物，今亦究无确证。”清末学者叶昌炽认为此实为道家符录，鲁迅先生《门外文谈》也称为道士们所假造。今衡山岫嵎峰禹王殿侧、望日台上及长沙岳麓山皆有所谓“禹碑”，为后人覆刻。清光绪《衡山县志》卷四十一载：“祝融旧无禹碑。今在望日台畔者，后人所刻，原非故物。至云密峰之禹碑，据《明一统志》在峰半。今峰半及本山崖谷，均未见有碑。惟衡阳岫嵎腰禹王殿侧，有碑，厚五寸，高六尺，阔四尺，字凡七十七，中有断纹，剥损六十七字，而龙画螺书，较岳麓、夔门所刻更觉奇古。”

岳麓山云麓峰禹碑高 1.84 米，宽 1.4 米，碑文 9 行，每行 9 个字，最末一行 5 字，共 77 字。明代《岳麓书院志》说：“嘉靖九年（1530），太守潘镒别土搨传。”除碑文外，目前尚保存有“禹碑”额、明代刑部刘汝南“夸神禹碑歌”、清代欧阳正焕“大观”石刻。

由于文字佶屈难辨，其碑文内容，许多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或以为记载大禹治水之事，或认为战国时越国太子朱句代其父越王不寿祭南岳颂词。也有些认为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近年来，又有人提出是一篇祭祀南岳衡山的卜辞。而今人多采用杨慎释文：“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衰，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甯舞永奔。”这段文字，与其说是释文，不如说是杨慎的创作。

禹碑是湖南历史上内容年代最古的石刻文献，在中国碑刻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也是湖湘文化中一个极具探索意义的神秘符号。（刘雪平）

楚简楚帛

在纸张发明之前，竹简木牍是中国使用最久的文献载体。湖南是迄今出土简帛数量最多、时代序列最为完整的省份。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上世纪末，湖南共出土简牍 10 余次，总计 20 余万枚，主要集中于长沙、慈利、沅陵、常德等地，尤以长沙居多。时代涉及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其中以三国简最多，秦简次之，汉简、战国简又次，晋简最少。

解放后湖南地区出土的战国楚时期的竹简主要有：1952 年在长沙五里牌 406 号墓出土残断楚文字简 37 片，简上字多者 11 字，少者仅 2 字，内容为遣策（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1953 年在长沙仰天湖 25 号墓出土较为完整的楚简 43 支，内容为遣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最著名的战国楚简，史学家史树青曾著《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一书，罗福颐、商承祚、李学勤、郭若愚、何琳仪等人也都有专题论文；1954 年在长沙杨家湾 6 号出土楚简 72 支，有字者 50 支，每简都有为便于系带编联的两道切口，但内容模糊不清；1980 年在临澧九里 1 号墓出土楚简数十支，内容为遣策；1983 年在常德市德山夕阳坡 2 号楚墓出土 2 支，一简 32 字，一简 22 字，其中一简有纪年，记载楚怀王二十二年越涌君嬴率众归楚之事；1987 年在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残简 1000 余枚，字数超过 2 万，其中一些内容可在《国语·吴语》和《逸周书·大武》等书中得到对勘，还有一些是与《管子》《宁越子》等内容相关的佚文或古佚书。

这些简牍都是湖南历史上出土的最早文献，以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为主。文献内容较为单一，文字短少，而慈利石板村楚墓残简文字虽多，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篇章，且至今尚未整理完毕。

在简牍流行的同时，缣帛作为一种文献载体也同时存在，主要用于绘图或图文并茂的文献。

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也称“缙书”，“缙”即为“帛”之总名，它也是湖南地区产生最早的内容比较完善的典籍文献，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实物。该帛书上下高 38.5 厘米，左右宽 46.2 厘米，原件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全文为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段文字，一段 13 行，一段 8 行，可分为甲、乙篇。周边是作旋转状排列的 12 段文字，每边三段，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四木相隔，每段各附

有一种神怪图形。全篇共有 900 余字，甲篇强调“敬天顺时”，上天的神帝被描绘成具有施德降罚本领的命运主宰，所谓“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乙篇主要是讲神话，与甲篇互为表里。边文 12 段，每段代表一个月份，略述该月宜忌，如某月可不可以嫁娶，某月可不可以行师用兵，某月可不可以营筑屋宅等。

帛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949 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上下高 31 厘米，左右宽 22.5 厘米，构图共分三层，上层为天空，左上一龙，右上方为凤，凤鸟形状苍劲奋起，有飞升天国仙界之意，中部偏右画一侧立妇女，为墓主形象，高髻细腰，广袖宽裾，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1973 年在长沙子弹库又出土一幅“人物御龙”帛画，上下高 37.5 厘米，宽 28 厘米，画图中一男子，侧身左立，危冠长袍，手持长剑，持缰御龙，龙奋首卷尾，龙尾立一鹤，作昂首长鸣状。龙首直下水中有一条游动的鲤鱼。画的上端有一华盖遮于人物头顶之上，华盖有三根垂飘的丝穗。这两幅帛画，都表现出同样的主题，即描绘墓主人死后乘龙驾凤升天的欲望，是楚人引魂升天的宗教思想在绘画题材上的反映，也是目前所知湖南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具有极高的宗教、艺术价值。今藏湖南省博物馆。（寻霖）

敦煌写经

敦，大也。煌，盛也。东汉时应劭就对“敦煌”一词做出了如是解释。敦煌是广开西域的一个重要汇合点，被称为“西域之门户”、“华戎所交大都会也”。古代敦煌的文化积淀极为深厚，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的汇聚之都，同时也是儒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种宗教的活跃之地。1900 年王道士改建灵宫、清理积沙的不经意之举，开启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莫高窟佛教艺术宝库。藏经洞里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这些写经、书卷、契约、信札、祭文等数以万计，内容芜杂丰富，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拜火教等方面的资料宏赡全面，书写年代最早的是西晋，最晚的则是北宋，前后相距约 600 年。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外强欺凌，敦煌宝藏并未引起清政府和当时学者的广泛重视，斯坦因、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和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极精美的敦煌写卷、佛画、丝织品，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不幸颠沛流离到世界各地，不得不让人感叹“敦煌者，吾国之伤心

史也”。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有6万多号，主要散落在：英国约15000号，法国约7000号，俄国约19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国内其它公私藏三四千号，此外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散藏1000多号。这位“历尽魔劫，恢心名利”的王道士成为了盗卖文物的民族罪人，这其中也有一位湖南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1907年3月，斯坦因到敦煌莫高窟考察，而担任其中文秘书的就是湖南人蒋孝琬，他与王道士巧妙周旋，用《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故事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骗到大量藏经洞经卷及佛画。蒋孝琬（1858—1922），湖南人。斯坦因记其字“yin-ma”，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蒋在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他经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介绍，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帮助疏通关系，同时教授斯坦因中文。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

历史的演绎往往没有固定的剧本，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数十年后竟有数件敦煌写经流落至他的家乡。国内所藏的敦煌遗书大多见之于国家图书馆和河西走廊诸省的文博单位，南方收藏非常罕见。而湖南图书馆的馆藏宝库里收藏有九件敦煌写经，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这九件写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图书馆用《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四部备要》等两万多册的古籍复本，同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三次交换得来的，一共换回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册善本书，这批写经一回湖南就得到了妥善而严格的保管。

这样巧妙的机缘，却让不少人质疑写经的真实性，鉴定之路漫长而悠远。四十多年来，先后有五批专家对这些写经进行过鉴定。早在1973年和1975年，故宫博物院鉴定小组成员刘久庵就两次到湖南图书馆看过写经，认定这批写经极具价值；1980年，故宫博物院徐邦达等专家抵达湖南，对湖南图书馆馆藏字画、碑帖、写经进行鉴定；2011年8月，因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机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广锬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馆员李际宁前来鉴定；2012年3月，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研究员进行了专业鉴定。这些专家均确认这九件写经为敦煌遗书，正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5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和9至10世纪（唐代）。

这些写经多用正楷书写，字体工整秀丽，历经一千五百年的岁月侵蚀仍然触手若新，纸色光洁，或黄褐，或白色，质地厚硬。尤其是《大智度论》第六，虽

仅存一纸，但纸张完好如新，文字依然清晰，浅浅的天然石墨划出的乌丝栏隔开每个字里行间，抄写年代大约在5世纪下半叶，是目前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而国内所藏的五世纪左右的《大智度论》敦煌写卷也不过寥寥可数的几件，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缓缓展开《妙法莲华经》写卷，你需要准备长达十几米的宽敞空间。敦煌遗书中，佛教文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凡重要的佛家典籍、几乎失传的佛典要籍大部分都能找到，而这其中最有多见的就是《妙法莲华经》。据估计，《妙法莲华经》在敦煌遗书总量中约占百分之十。《妙法莲华经》是中国佛教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一部大乘经典，此经“同安乐行品”曰：“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于诸经中最在其上。”

现存的敦煌遗书中《妙法莲华经》有7000余号，长超12米的全国才不过20余号，湖南图书馆所藏的这部经卷卷长105.6厘米，由22纸缀接而成，首尾俱全，殊为难得。本卷书法虽平拙无奇，错别字及脱、漏字较多，但瑕不掩瑜，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敦煌写经之书法风格和当时的书法体例。

隋唐时期的敦煌，佛教文化发达，僧众俗人、官员民众都非常热衷修建佛窟，抄经礼佛，追求纳祥积福，功德圆满，写经、抄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在当时写经成为一种谋生职业，写经者被称为“经生”。经生不仅有官府抄经书手，抄经規制严格规范，抄写、装潢、初校、再校、详阅、监制等程序步骤严密，也有不少民间写经生。胡适先生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过：“有些经是和尚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字习作，有些是施主雇人写的。”湖南图书馆所藏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卷后有藏文题记：jin legs kong gis bris，翻译成汉语即为“金来贡抄”，金来贡就是敦煌当时抄写藏文佛经较多的写经生之一。

经书抄录有统一的形式要求，拥有特有的用笔、结构和章法，因而形成了独有的写经书法风格，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写经体”。其主要风格是小楷，书写工整清楚，结体和笔法都有统一稳定的范式。然而敦煌写经体也体现了较高的书法水平，清人钱泳《履园丛话·收藏》中说：“其有瘦劲者近欧、褚，丰腴者近颜、徐，笔笔端严，笔笔敷衍，自头至尾，无一懈笔，此宋人所断不能跂及。唐代至今千余年，虽至经生书，亦足宝贵。”魏晋至隋唐，正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历史时期。敦煌写经中隶书、魏碑的余韵逐渐淡去，逐步走向秀润清丽、工整优雅的楷书书风，提供了丰富的楷书演变之史料。

本卷《妙法莲华经》，为不同人抄配，卷帙完整，十几米的经卷中虽有错漏

之处，书法稍显拙朴，但小楷书写，一笔一划仍工工整整，齐整规范，法度谨严，表达出抄经人对佛的皈依和恭敬。“即使这个经卷上残留有虫茧和粗糙式的麻绳接尾，我们也应该好好保留，正是它们诉说了敦煌遗书产生、流传饱经的种种历史沧桑。”方广锜先生在鉴定这批写经时这样说道。

宋朝人苏轼《次韵秦观秀才见赠》诗中写道：“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硬黄纸，是我国古代一种经过特殊的捶打工艺所制造的纸张。打纸纤维致密，纸张牢实，书写时也不易洇墨。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中写道：“硬黄纸，唐人用以写经，染以黄柏（檠），取其避蠹。以其纸如浆，泽莹而滑，故善书者多取以作字。”加工硬黄纸首先要“染以黄柏”，即染潢，用黄檠汁来防蛀。同时古人还用上蜡的工艺来延长纸张寿命，研光上蜡后，抗水光滑，纸张泽莹。这种经研光上蜡的黄打纸，在敦煌遗书中非常常见。湖南图书馆馆藏的几种敦煌写经，纸张保存皆完好如新，近似新纸，质地坚韧。如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十二黄麻纸粘接而成，蜡黄匀度好，莹澈透明，坚挺平整，历经千年依然莹洁夺目，不失艳丽之姿。

敦煌写经，梦落潇湘。我们在谈论敦煌遗书的流失、内容、价值之余，更应感受到传承中华文明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刘雪平）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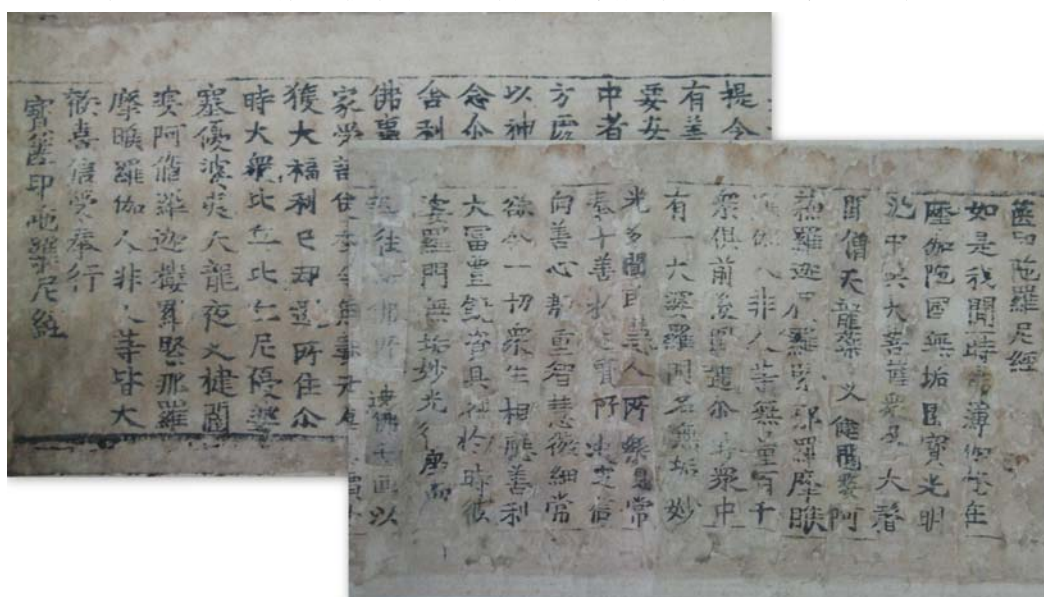
最初，文献以缮写的方式产生，每抄写一遍，只能产生一册，事倍而功半。因此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的数量极少，只有少数有钱、有闲阶层才能拥有一册或一部图书。雕版印刷术运用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变。雕版印刷是先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再板上刷墨、铺纸印刷的一种方式。每块雕版雕刻完成后，可一次刷印数百页甚至上千页，图书的产生因此变得简易，图书不再是贵族、士族阶层的奢侈品，知识从此开始向平民阶层流通。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唐之际，完善定型于宋。目前存世的中国宋元雕版印刷品不足两千件，且多为残本及复本。因此，宋元刻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各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皆以拥有一部宋元刻本为傲。

湖南图书馆藏有宋元刻本 30 余部 500 余册，其中年代最早的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吴越国王钱俶（原名钱弘俶）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因其来源于西湖湖畔雷峰塔，故又称雷峰塔经。雷峰塔，又名黄妃塔，原为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其妃祷福所建。后因一段“白蛇传”而受到人们的憎恶，在感慨白素贞对爱情坚贞执着的同时，人们也在责备着法海和尚的多事。

1924年，雷峰塔终于在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后轰然倒塌，鲁迅先生还为此特作《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蜂拥而来的人们在废墟中寻找着讹传的“金砖”，以至大多数经卷被践踏成泥，只有少数幸存下来。本经卷即是在塔砖侧面的小孔里发现的。

钱弘俶为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面对北宋政权的咄咄逼人，钱弘俶审时度势，决定称臣入贡，并为避宋帝讳而改名为“钱俶”。开宝七年（974），宋太祖赵匡胤平江南，钱俶出兵策应，被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仍称吴越国王。然而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入朝被扣，不得已，举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国灭。



经卷卷端镌“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后为一幅小巧的“文殊菩萨讲图”，再后为经文。“乙亥”为北宋开宝八年（975），此时距赵匡胤黄袍加身仅十五年，尚未真正统一全国。

目前存世的宋代雕版印刷品多为南宋时所刻，湖南图书馆所藏北宋初年刻《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对我们了解北宋初期政治概况及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展、古籍装帧形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寻霖）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责任编辑：宁阳 寻霖 李娇 侯永慧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169号湖南图书馆3102室

邮编：410011

电话：0731-84174012